



旧中国邮电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人民邮电出版社編

· 内 部 发 行 ·

旧中国邮电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人民邮电出版社編

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编了《人民邮电》报刊载的邮电通信史话和邮电职工忆苦思甜的文章，可以作为邮电职工阶级教育学习参考材料。

旧中国邮电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编者：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

出版者：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

北京东四 6 条 19 号

(北京市市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〇四八号)

印刷者：北 京 邮 票 厂

发行者：人 民 邮 电 出 版 社

内 部 发 行

开本 787×1092 1/32

1965年9月北京第一版

印张 2.30/32 页数 42

196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字数 59,000 字

印数 1—79,500 册

书号：总 1526—综 103

定价：(科2) 0.17 元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經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擺脫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經過怎样的長時間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間經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出版說明

為了給郵電職工提供階級教育參考讀物，我們選擇了部分郵電通信史話材料和郵電職工回憶對比的訴苦材料，匯編成這本小冊子，在企業內部發行。這些材料雖然只是舊社會郵電工人苦难生活的一些零星片段，但從這些片段材料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整個郵電工人在舊社會所遭受的種種苦难和殘酷剝削。這本小冊子內的文章絕大部分都在《人民郵電》報上發表過，匯編時，我們又對材料內容重新進行了核實。對於本書的匯編，讀者有什么意見，希望及時告訴我們。

人民郵電出版社

1965年7月

目 录

出版說明

旧中国邮电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董新远 (1)
一颗红心永向党	蔡金龙 (29)
血泪半生 永不忘本	王惠元 (37)
记住深仇大恨 不忘阶级斗争	唐应凤 (44)
写不尽的阶级深仇	云 典 (51)
昂然不屈战凶魔	孙蕙敏 (55)
血的控诉	李国茂 (59)
深仇大恨永不忘	孙聚宝 (62)
“报差”的苦难	纪正才 (65)
“邮差”的遭遇	李运成 (70)
“信差”的命运	陈遇春 (72)
押车二十年	武存德 (75)
盛暑话今昔	蔡阿毛 (77)
狗碑	施威全 (79)
插图：安致	

旧中国邮电工人的苦难和斗争

童 新 远

一、帝国主义对中国邮电主权的侵犯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对中国邮电主权的侵犯，是为了把邮电做为侵略中国的一种先行工具，以达到奴役中国、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目的。

鴉片战争带来帝国主义的“寄邮”

十八世紀末叶到十九世紀初期，英國資本主义 侵略了印度，緊接着侵入中国。当时英國資本家侵略中国的手段，主要是以英國廉价的棉織品换取印度的鴉片，以鴉片掠夺中国的白銀。隨着英國鴉片貿易的侵略，引起了1840年的“鴉片战争”。

鴉片战争失敗，迫使清政府放棄閉关自守政策，于1842年訂立了“南京條約”。在“南京條約”里規定了五口通商（广州、廈門、福州、宁波、上海）。从此，西方資本主义长驅直入，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58年第二次鴉片战争失敗，清政府和英國簽訂了喪权辱国的“天津條約”。在該條約第四款規定“大英欽差大臣并各隨員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裝囊箱不得有人擅自启拆，由沿海无论至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驛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中法“天津條約”也有同样規定。后来，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借口“利益均沾”，迫使清政府接受了相同条件。

西方資本主义，看准了清政府的軟弱可欺，便不管什么條約不條約，隨着他們各自的侵略活動，帶來了所謂“客郵”。

早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即香港主權還屬於中國的時候，英國駐華公使璞鼎查便以“英國香港總督”名義發出通告，開設英國的“香港郵局”。從此，英國便以香港為基地，五口為前哨，在中國領土上任意開設英國郵局。各資本主義國家也競相倣效。法國於1861年，美國於1867年，日本於1876年，德國於1886年，帝俄於1897年，先後在上海設立了本國的郵局。十九世紀末葉，各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這種“客郵”局又隨著各帝國主義一次又一次的侵華戰爭，不斷擴充。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形形色色的“客郵”局，已遍及中國沿海、沿江、內地，並遠及西藏、新疆、東北等邊疆地區。除單獨的信箱信筒不計外，單是各種局所即多至二百四十余處。

帝國主義的所謂“客郵”，實際上是他們交流情報和走私的機構。帝國主義的勢力侵略到哪裏，“客郵”就伸張到哪裏。“客郵”變成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侵略的觸須。

“郵政獨立王國”的形成

帝國主義各國，並不以在中國取得“客郵”特權為滿足。英帝國主義代理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還一心一意謀取整個中國郵權。赫德是個怎樣的人物呢？只要看看他針對義和團起義事件所寫《中國實測論》一文就够了。他說：“……故論中國最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為今之計，列國當以瓜分为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在當一面設法，順從中國人之感情，使其漸忘其軍事之思想，而傾服于我歐人。如是則將來

所謂‘黃禍’者，可以烟消烬灭矣”。赫德表面上順从中国人之感情，实质上却是要瓜分中国。他官至尚书（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长一级），是清政府外交、内政的幕后提线人，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执行者。在中英之间的许多外交活动中，赫德经常一面操纵清政府，一面给英国政府外交部和英国驻印总督出谋划策，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驻华的头号大坐探。1861年他就向清政府建议“照西方办法办理邮政”。1866年他取得了海关兼办邮政权，后来得到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1878年又取得了扩大试办邮政权。1880年在各海关设立了一套十足帝国主义气味的“海关拨駢达”（拨駢达即英语Post的译音，意为“邮政”）。

当时，中国的通信组织有驿站、民信局和其他各国的“客邮”等等。赫德唯恐与这些通信组织相竞争，没有清朝皇帝的支持，力量不足，便一再通过李鸿章要求清朝皇帝正式批准，允许他在全国办理邮政。赫德向清政府冠冕堂皇地说，如批准他在全国办邮政，对驿站不能给政府以“烦扰与困难，从而避免磨擦”；对民信局不能给予“不必要的干涉，致损业此者之生计”；对客邮则一再表示取缔，“收回国家邮权”。他一直谋划了二三十年，1896年终于得到清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委赫德为“总邮政司”，“专司其事”。从此，赫德便打着“大清邮政”招牌，夺取整个中国邮权。他对“客邮”拿出“主”的身份，对驿站拿出“洋”的身份，对民信局拿出“官”的身份。以“官”对“民”，以“洋”对“官”，以“主”对“客”，勾结“客邮”，孤立驿站，打击民信局。他把“客邮”局当做“国际邮政联盟的分支邮局”，订立合同，叫他们替他传递国际邮件。把驿站当做敲门机构，规定官方文件，先由邮政传递，然后再交驿站递送副本核查，促使本来早已腐败不堪的驿站，很快弄成“裁驿站归邮”，归于淘汰。但对民信局的竞争却非常激烈。因为民信局一向为中国民间工

商业所信任，传递很迅速，并能上门收攬邮件和隨到隨投。赫德为击败民信局，規定民信局必須向“邮政官局”登記，邮件总包必須交“官局”代运，不准直接交火車、輪船带运，违者要緝拿查办。此外，他还以猛烈降低邮資的办法，如国内平信由紋銀4分降为1分，本埠平信由4分降为半分，以資本主义一貫使用的垄断手段来对民信局进行打击。民信局本为一种剛剛抬头的民族資本主义的通信企业，当然受不了帝国主义这种垄断手段的打击，紛紛倒闭。最后，終于規定邮政为国家专营，民信局营业为违法，赫德这才取得中国邮政的垄断权。

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邮权的霸占，引起了法帝国主义的眼紅。1896年，法国政府迫使清政府接受了这样一个条件：“将来中国邮政局陸續推广，招募外國人員，其法國人員，亦应公平令其同办”。1911年清政府欺騙人民，假意試办“君主立宪”，成立邮传部，向海关要求接办邮政。这时赫德已回国养病（后来死了，沒有回来），法帝国主义便乘机夺取中国邮权，由原在海关邮政任邮政总办的法帝国主义分子帛黎夺取了赫德的实权。帛黎之后，又为法人铁士兰承袭总办职位。在这段时期内，中国邮政为以英法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所垄断。上自邮政总局，下至各邮区，完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吏均无权过問。从此，中国邮政，名义上挂的是“大清邮政”或“中华邮政”的招牌，实质上成了英法帝国主义集团霸占的“独立王国”。

电信主权的丧失

帝国主义对我国电信主权的掠夺，也是随着西方資本主义的侵略，一步步加深加剧的。在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的电信主权以前，已經有两条国际电信线路伸展到我国边疆：一路系水綫

由伦敦經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到达香港；一路系陆綫由东欧經帝俄西伯利亚到达海参崴。經營这两条綫路的帝国主义份子都虎視眈眈地要求把綫路伸展到中国。先是英国要求将香港水綫敷至上海，帝俄要求由西伯利亚經恰克图接綫到中国北京，均遭清政府拒絕。但是，到1871年帝俄政府慇惠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由海参崴敷水綫到日本长崎，由长崎又偷偷摸摸設到上海租界，并且公然在上海开局营业。清政府不但不敢过問，而且当丹麦大北公司糾合英、美、法、俄、德五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照会”，指責中国漁船不斷伤坏公司水綫，要求制裁时，清政府却复照解釋說：漁船伤毀水綫，实非故意，今后“如何設法防范之处，轉飭地方官随时办理”。不仅默認电信主权的被侵略，并負責予以保护了。而李鴻章还自圓其說道：“丹麦小国，其人易于駕馭”。哪知丹麦大北公司，挂的虽是丹麦的国旗，实际上它是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挪、英电报公司合組而成，它的股东主要是英国資本家和帝俄的皇室。丹麦大北公司的入侵，实质上是英俄資本主义入侵。

清政府既然引狼入室，那就很难拒絕其他电报公司的侵入。于是1883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水綫也由香港敷設至上海，在上海开局营业，并强迫清政府簽訂合同，承認了大东电报公司的入侵权。

1900年，义和团农民起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八国联軍进攻天津、北京，义和团乃将中国北方电报綫全部切断，迫使各侵略軍不得不派海上快艇解决其通信困难。大北、大东两公司認為这是进一步夺取中国电报主权的大好时机，便与各侵略國密謀，由两公司迅速修建了沪烟沽水綫和烟沽副水綫。当时清政府腐敗得一塌糊涂，不仅不敢阻挡帝国主义这一重要軍事

通信綫，反而以二十五万八千英鎊的高价向两公司爭到一张“合同”，名义上主权属于中国（这笔价款作为外債，分三十年还清），实际上款由我付，綫由他用，真是岂有此理！同时，两公司还为了滿足英、俄、德战略需要，又从烟台分別給各帝国主义代建了烟台威海卫、烟台旅順、烟台青島間的分支水綫。另外，清政府还允許把自建的北京、恰克圖陆綫借給公司无偿使用，期限也是三十年，而換取代建了一条京沽陆綫，使帝国主义的軍用通信由上海、烟台、大沽直达北京，更加方便。德国为了自己更加方便，还从青島經济南到天津修建了自己的軍用陆綫，从青島到上海修建了自己的水綫。法国也在1900年利用軍威，把水綫由越南修至廈門强行登陆。八国联軍侵略战争，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电信主权，造成为所欲为，任意分割的局面。

为了分肥絕不落后，1904年美国太平洋水綫公司也从旧金山經檀香山、中途島、关島、菲津滨而达上海。大北、大东、太平洋三公司联合起来，迫使清政府簽訂“齐价摊分合同”，共同操縱中国电报主权。从此，中国电信主权，四分五裂，各个帝国主义的陆綫、水綫，由四面八方伸进来，和中国自有的电报綫，在沿海、沿江和边疆到处接通，使帝国主义的情报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后来又經過北洋軍閥的大肆卖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內鎮压、对外投降的种种反动政策，邮电主权大半丧失，甚至許多重要城市、重要地区的市話、长話、无线電，也被各帝国主义掠夺。帝国主义的旅館、公司、个人也可以任意在中国开办邮电。尤其是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經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更在它企图独吞整个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将大半个中国邮电主权全部夺去。

二、邮电工人头上的层层压迫

旧中国邮电工人，不仅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而且遭受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走狗的走狗的奴役和压迫；不仅遭受着封建军阀的镇压和剥削，而且遭受着封建军阀的爪牙及其爪牙的爪牙的镇压和剥削；不仅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恶统治，而且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黄色工会、特务、走卒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压在旧中国邮电工人头上的是千重山万重山，数不尽的层层压迫。

骑在职工头上的特权阶级

清朝四品以上的高官，才有资格称“大人”。洋员一到中国，就喜欢乘八抬大轎，叫中国职工称他们为“大人”。此为“洋大人”名称之由来。“洋大人”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

1909年在“洋大人”自己编的邮政年报中，洋洋得意地写道：“……随着时间与邮务的演进和发展，一个完全属于邮政的洋员班底形成了，由他们来管理所有邮政事务，不論是通商口岸，抑或内地……”。

这个“洋员班底”，从来不受中国政府的节制，任何問題都自作主张。如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公然在“大清邮票”上加盖“临时中立”四字，后来遭到中国人民及邮政员工反对，又索性再加盖“中华民国”四字，而“临时中立”四字仍然存在，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花纹，加盖着“中华民国、临时中立”稀奇古怪的邮票，以表示他们蔑视中国国家主权，仇视中国人民革命。

他们把持着一切重要职位，如“邮政总办”等。按清朝或北洋



那时，“洋大人”喜欢乘八抬大轎，騎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

政府的体制來說，“政邮总办”并非最高掌权者，总办之上还有“邮政总局局长”，局长之上还有“交通总长”。“邮政总办”并无最高权限，但自帛黎从赫德手中夺得中国邮政大权之后，便擅自自在《邮政綱要》第一条规定：“邮政总办有最后决定权”。另外还規定“邮政总办有录用、撤退、升降及調遣人員之权”。果然，邮政系統，从总办起，总局各处处长、各区邮务长、会計长、一等局局长，所有一切要职，便都由洋員充任。而邮政总局局长和交通总长却无权过問。直到1920年，因邮政总办法人铁士兰与法国驻华公使有私人矛盾，法国公使要更换铁士兰，被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綽挽留，保全了铁士兰的地位和面子，铁士兰这才勉强答应叶恭綽的要求，同意調派两个华籍邮务长于

貴州、甘肅等貧瘠邊遠地區。葉恭緯身為交通總長，本來是鐵士蘭的最高上級，推薦人尚如此困難，郵政總局局長當然更是“聾子的耳朵”，只能擺擺樣子了。

洋員不僅把持著種種要職，還享有種種特殊待遇。凡是洋員，每人都有一套“公館”。在公館中建有洋房、花園、球場，洋房中設有宴會廳、跳舞廳、餐廳等等，備有古玩玉器，象牙雕飾。只是鐵士蘭“公館”中的家具一項，就價值三四萬元。郵務長巴立地在北京的“公館”，等於一個國家的駐華大使館。這一切設施，包括公館中的花匠、聽差、传达、保姆等等人員工資，以及專供欣賞的小鳥、金魚、花貓……都由公款开支。

洋員的生活也是特殊化的。巴立地任山西郵務長時，他不吃太原的菜，却特制一套六面通風的木箱，每天由天津郵局給他購買鮮菜，做為“郵政公事”交押車員帶運太原。英人李齊任湖北郵務長時，也備有一套鐵皮箱，每天由上海郵局為他採購洋點心、餅干、罐頭、洋酒等，做為“郵政公事”交由長江輪船郵局局長為他帶運漢口。法國人湖南郵務長饒略及其會計長博禮，在其辦公室近旁，每人專備一個廁所，廁所內專設一個洋瓷馬桶，雇着兩個專職女工，為他們做清潔工作。連饒略和博禮用的手紙都是從外國進口的。

洋員們還喜歡在中國人面前大抖威風，有的辦公室距離公館不過步行五分鐘之遙，也要備有汽車，尤其喜乘八抬大轎。長沙街上有一位姓李的警察，每次看見“洋大人”的轎子過來，總是立正、舉手、行注目禮，後來得到“洋大人”賞識，叫長沙郵局單獨舉行一次考試，只准這個姓李的警察一人報名。這位警察不懂英文，這次考試還經郵務長特准免試作文，一試而為“郵務生”（相當於現在的支局長、縣局長、營業組長等）。印度人杜達任甘肅郵務長時，一次出城門，路過崗警，崗警沒有

向他行礼，这位“杜大人”馬上給了这位警察两个耳光子，事后，还由兰州警察局长亲赴邮局赔礼道歉，警察被革职。

一层套一层的奴役和压迫

帝国主义統治者，对待中国員工，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帝国主义把邮政职工分成了許多类别和等級。但概括起来，不外三大类：一类是高級人員，如邮务长、副邮务长、邮务官，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帮助帝国主义进行統治的爪牙；一类是中級人員如邮務員、邮务生、拣信生；另一类是雇佣差役，如信差、邮差、听差、苦力等等，完全是被奴役、受压迫的工人。

邮务长、副邮务长必須从“邮务官”中提拔，而“邮务官”又必須經過洋邮务长保举才能参与考試。如果一个邮務員只会講洋話、做洋事，而不善于巴結“洋大人”，帮助“洋大人”統治下层职工，那就休想参加“邮务官”的考試，即使参加也考不上。邮务官考試共有十二門課程，每門滿分为 100分，共1200 分，可是洋邮务长的保举分可以一下加給300分。如果十二門課程只考得平均分60分，但加上洋邮务长的“完全滿意”的300保举分，就可得到总平均85分。所謂“邮务官”考試制度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騙人把戏。考中邮务官，还可以提拔为副邮务长、邮务长，而提拔邮务长、副邮务长是靠能不能甘当“奴才”做标准的。如叶恭綽要求由鐵士兰派充的甘肃邮务长陈发涛，就是以欺压邮工而得到賞識的。陈发涛在当甘肃邮务长时，經常检查信差、邮差等工人的工資。工人的工資一般要隔一两年 才能增加月薪一元，可是陈发涛每逢看到工人工資稍微增高一点时，便借故将高工資工人开革，借此以显示他能为帝国主义賺錢。陈发涛用这种剥削工人的手段才得高升。貴州邮务长刘书蕃，原本是天津一个邮務員，靠着出卖“中华全国邮政协会”（这个协会当

时以組織全国总罢工，打倒帛黎为目标），向洋人告密，才爬上邮务长高位。这些奴才走狗，虽然骑在中国邮政工人头上，甘心做帝国主义的爪牙，但他們的工資还是不能和同級洋員相比的。例如，1922年公布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未变的工資标准，洋邮务长最高月薪1875元，最低1200元，而华籍邮务长最高只有1050元。洋邮务长服务滿六年，便可請一年照支全薪的长假，回国周游一番，回国旅費完全由公款报销，連洋員帶的媯姆，都按規定可以坐二等車或二等艙。但是“洋大人”却不給他們的奴才这么高的享受。

广大邮政中层职员，必須服服貼貼地忍受“洋員”及其“走狗”的支配。那些高踞在他們头上的洋員和洋員的奴才，实际上并不懂或不熟悉邮政业务，特別是那些洋員初来时，办事只能由別人翻譯，画押签字，摆空架子。过一个时期，他們对邮政业务略懂一些，便气焰万丈，中国职员偶有一言不合，或是听不懂他們用法国、瑞典、挪威等國語言講的蹩脚英語，便声色俱厉地給以訓斥，說“你不懂英語，怎么做克拉克（即邮務員）！”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办中国邮政，說話用洋話，写公事要用洋文，連中国职员向中国人講話，也都得用洋話。这还成什么中国邮政！

帝国主义对中国职工，还有一套“顏色考績制度”。大紅色为最优等，淡紅色为优等，兰色为中等，黃色为劣等。誰是什么顏色，由主管人秘密填報。密報时給你來个兰色，便休想晉級；如果來个黃色，便有隨時被裁汰的危险。在旧社会中誰不怕失业呢？于是这些中級职员，大多数也变成被压迫阶层。

最受压迫最受奴役的是最广大的底层工人。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象机器人一样，轉来轉去。只是上海等大城市，信差們經過斗争，才获得每月一天的